



# 郑振铎在上海暨南大学

文章正元

1927年，在上海成立的国立暨南大学，校址在真如。1937年“八一三”事变中，侵华日军飞机大炮把暨大美丽的校园炸成一片废墟。为了坚持办学，暨大迁入了租界康脑脱路（今康定路）528号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临时校舍。

郑振铎（1898—1958），原籍福建长乐，生于浙江永嘉，笔名西谛。1935年初，郑振铎应邀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。

在康定路528号暨大临时校舍的工作期间，郑振铎主讲《中国文学史》时，激昂地讲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坚持民族气节而流芳百世的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诗篇。例如讲到文天祥的《过零丁洋》里那句千古不朽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诗句时，他一边高声朗诵，一边热泪盈眶，使同学们非常感动。他创作的《致死者》《回击》等诗，以锐利的诗笔，如匕首，如投枪，愤怒地掷向敌人的心脏。他主编了《世界文库》，先后选编了69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。他还参加了以出版进步书籍为主的秘密组织——复社。他和胡愈之等人在四年时间里，先后翻译、整理出版了20卷的《鲁迅文集》，以及《列宁选集》《联共党史》等，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版了埃德加·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取名《西行漫记》，为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提供了坚持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。

许多人都在语文课本里读过法国著名作家都德写的小说《最后一课》，小说讲的是普法战争期间，法国的一个小镇被普鲁士军队占领。窗外是普鲁士士兵，教室里，老师用法语给学生上最后一课。但



上海暨南大学旧址插画

章正元/供图

却很少有人知道郑振铎也上过一堂动人心弦的“最后一课”。

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侵入租界。12月8日这天清晨，校长召开了全校教师会议，会议简短而悲壮，决定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学校门口，就立即停课，关闭学校。会后，郑振铎走进教室，向学生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后照常上课。大家明白这是“最后一课”。这天学生们在课堂里默然无声，听得格外认真地，郑振铎讲得也是格外地清晰，声音中透出沉着和坚毅。终于，远处传来沉重的车轴辘声，郑振铎透过临街的教室窗户，看到几辆日本兵的军车来了，当

头飘着血红大点的日本旗，他合上了书本，沉着地向学生宣布说：“记住，现在是10点30分，下课！”学生们全体起立，默不作声，只有几个女生发出了低低的抽泣。这是发生在中国上海康脑脱路暨南大学临时校舍，发生在郑振铎上课的教室里的悲壮一幕，反映着中国人的骨气和正义，与法国著名作家都德所写的小说《最后一课》同样感人。

郑振铎“孤岛”救国宝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除了暨南大学授课外，还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。他在一年多的课余时间，呕心沥血地为国家抢救、收购散失的一大批珍贵古典文

献，其中《古今杂剧》一套64册，元明杂剧242种等，许多重要文献和珍本图籍就有4000种左右。郑振铎为觅藏书记找到赵朴初商量时，赵朴初建议：“我有个主意，日本人信佛教，尊重寺庙，没有发现问题鬼子兵不敢乱闯佛门圣地，不妨尽快把文献古籍转移到我们觉园佛教净业社的‘法宝馆’来，‘法宝馆’本来就是珍藏佛经典籍的书库。”这样，一批约3800余册珍本转移到了觉园“法宝馆”。直到1949年12月12日，董必武率中央接收工作组到上海，这批珍本古籍完美地交给了中央政府。

郑振铎自从暨大迁来康脑脱路528号后，为从教方便，先后租赁了距学校不远的地丰路（今乌鲁木齐北路）地丰里6号和愚园路庙弄44号（现已拆除）作为下榻的寓所。暨南大学停课，为了躲避反动分子的暗杀，郑振铎先后在汶林路（今宛平路）、居尔典路（今湖南路）朋友家中隐居。直到日本投降，他才搬回庙弄继续居住。

郑振铎建国后到北京，先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等职。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、文学评论家、文学史家、文献学家、艺术史家、考古学家、编辑出版家、藏书家和社会活动家。他是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，《国际歌》的第一位中译者，“漫画”一词的发明人。郑振铎是“五四”以来文化界少数几位“全才”之一。1958年10月18日，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，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。

暨南大学临时校舍后为上海第九制药厂址。暨南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。

（内容摘自《静安文博钩沉》）

## 江宁路昔日巡捕房见证历史

文章正元

戈登，英国侵华军官。英国殖民者曾以其命名“戈登路”（今江宁路）。江宁路511号这幢三层房屋，建于1921年，坐北朝南，混合结构，红砖外墙，四坡红瓦顶，属英式公共建筑风格。南立面三个屋顶为人字形尖顶，并有石雕装饰，其部位外凸。底楼中间为主入口，洋松地板，木门、钢窗，窗框呈大券拱，窗沿、门楣的上方均有石雕图案花饰，其他部位的窗框呈长方形。建筑的东立面也有一个屋顶为人字形尖顶，亦有石雕装饰。建筑有壁炉、烟囱。主屋建筑面积1950平方米，屋前原有700余平方米空地。

上海租界始于1845年，逐步形成英、美、法租界。后来，英美租界合并称为公共租界，设立了统一的市政机构，叫工部局。法租界为公董局。近代上海人把租界里的警察称为巡捕，警察总署称为总巡捕房。巡捕房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最早的警察机构。公共租界巡捕房初设于1854年7月，后隶属于工部局警务处。到1935年，公共租界设中央巡捕房和下辖13个巡捕房。中央巡捕房在福州路、江西路口的10层大厦（今福州路185号），作为各巡捕房的总指挥部。租界收回后，此处曾为市警察局所在地，后为上海市公安局址。

起先，巡捕一律由西方人充任，故称为西捕。由于西方人办案受到语言等方面的限制，不但费时费力，且破案率不高，必带来不良影响；西捕无能，租界治安堪忧。于是改为允许华人充任巡捕，称为华捕。此后，华捕越雇越多，怕不易控

制，自1884年开始，任用来自越南的印度籍巡捕，上海人称为“红头阿三”。这些身高马大，满脸虬须，头缠红巾，脚蹬皮靴，巡逻在马路上的印度巡捕曾是旧上海的街头一景。法租界在这方面的做法与英美公共租界大同小异，他们任用的是安南巡捕。

20世纪初，京剧大师盖叫天等人常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的洋泾浜畔练功。“洋泾浜”原是黄浦江的支流，后成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河。填浜筑路后，取名为爱多亚路，上海解放后改名为延安东路。一天，盖叫天练功后沿着洋泾浜畔走回家，边走边练起“打飞腿”，还发出了“啪啪”的响声。一个印度巡捕见状，即以“扰乱治安”为名，要抓他去巡捕房。面对这蛮不讲理的“红头阿三”，年轻气盛的盖叫天飞起一个扫堂腿，冷不防将印捕摔了个狗啃泥，随后箭步穿过木桥，到了法租界。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越界抓人，气得那印捕望“浜”兴叹。

上海一霸黄金荣曾当过多年华捕，也可以说他是靠华捕发迹的。黄金荣当华捕所专管的十六铺地区，货船云集，店铺林立，有一帮小瘪三专干偷抢拐骗等坏事。黄金荣当了华捕，找这个团伙的首领谈判，双方一拍即合，还想出了不少生财之道。小瘪三们以前常常偷抢货船财物，现由黄金荣向船主保证，今后不再发生偷抢事件，条件是船主们每来一船货必须向黄金荣交纳一笔保护费，然后黄金荣与首领坐地分赃。对店铺，“小瘪三”们可以继续去胡搅蛮缠，



戈登路巡捕房

章正元/供图

敲诈勒索，但一见黄金荣必须告饶逃遁，目的是要老板们视其为自己的保护神，不时向其“进贡”。他们对于不“进贡”的店铺就一直去闹，闹得做不成生意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十六铺地区凡店铺都向黄“进贡”。这样，黄金荣则收一石三鸟之功：以镇得住“瘪三”流氓而扬名，日进斗金，得到上司的嘉奖、提拔。黄金荣还广收徒弟，扩大自己的恶势力，终于成为沪上头号黑道人物。

在上海近代史上，巡捕可谓臭名昭著。他们不但破坏中国革命，逮捕共产党员；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，酿成震惊中外的“五卅惨案”；而且与黑社会沆瀣一

气，一些偷盗团伙、帮会分子气焰嚣张，扰乱一方平安。法国人梅朋·傅立德在其专著《上海法租界史》里写道“整个巡捕房的风气是很糟糕的……”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，这个租界及其巡捕体系才逐渐消失。

上海解放后，江宁路511号曾为培进中学使用，后变更为静安区税务局和静安区副食品公司租赁，1991年6月以上两个单位搬迁后，由静安财贸中专学校使用，后为上海商业会计学校静安分校。如今，它作为时尚和创意人士聚集之地，焕发新的光彩。

（内容摘自《静安文博钩沉》）